

中山先生观看我们军事演习

王之宇^①

南下投奔黄埔军校

我出生于一九〇六年夏历一月十五日，籍贯河南洛阳，家住南乡八里堂村。父亲在洛阳蚕桑学校当校长，我五岁随父进洛阳城，父亲常教我识些字。到九岁时，又跟父亲到了开封，我入开封第一师范附小读书，十四岁时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三次英文科，一九二三年毕业。

次年，国民党“一大”在广东召开。我们学校的国文教员魏松声老师（同盟会会员）在一次谈话中，动员我们去报考军校。他说，现在广东开办了黄埔军官学校，准备成立革命军队，这是中山先生和国民党创办的，与北洋军阀的军校在性质上是不同的，并介绍了一些军校的情况。我和侯镜如都表示到了广东去投考的愿望。魏松声就给我们写了介绍信，由河南省参加国民党“一大”的代表宋聘三具了名。

一九二四年初春，我和镜如二人携介绍信先到了上海，按址找到了环龙路44号国民党的办事处，准备参加考试。没想到我们已经迟到，第一批考试早已结束。办事处的一位负责人安慰了我

^① 王之宇现为江苏省政协委员。

们几句，要我们先住下等一等。于是，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左右，在上海女子师范学校进行了第二批考试。初试通过不久，遂由办事处发给路费，启程前往广东。因路上当局盘查甚紧，我只和镜如二人同行。到了广州，又住了一个月，才得以参加复试。五月五日，我们作为第一期学员正式进入黄埔军校。

初 入 军 校

进校后首先进入入伍生的实习阶段。具体是熟悉内务条例、陆军礼节、陆军惩罚令等日常生活条规。几个星期后，入伍生实习结束。我们第一期学员共编为四个队，每队约一百二十人。正取生编为一、二、三队，备取生为第四队，原因是学校设备条件跟不上，容纳不下这么多人，故才设了备取生的第四队。我被编入第三队，队长金佛庄（保定八期毕业）是共产党员，排长郭俊也是共产党员，其他各排排长还有惠东昇、张强桀、吴济民等人。我队同学有杜聿明、阎奎耀（揆要）、侯镜如、关麟征、袁守谦、陈赓、黄杰等。

学校在筹备初建时期，蒋介石是负责人之一。据我们所了解，蒋原在粤军许崇智部当参谋长，当年，蒋从保定速成班毕业，到上海与陈其美在一起呆过很久。他靠了这一层关系，到了广东中山先生的身边。蒋从广东回上海时曾对中山先生说，陈炯明有叛变迹象，到时候我再回来。后陈炯明在广东叛乱，孙中山在观音山遭难，蒋由上海又回到广东，跟在中山先生左右，故中山先生对蒋很信任，遂委托他筹办军校，派他到苏联进行短期考察。另一主要筹办人是廖仲恺。为办黄埔军校，廖先生花了很大的气力。他身任财政部长和广东财政厅长数职，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

为办校想方设法筹措款项。当时滇、桂军阀杨希闵等人驻在广州，他们私开烟馆、赌摊，有很大收入，广东政府遂通过与他们协商来解决一些财政开支。为学校的经费，廖先生经常去找杨希闵等人，杨常常在烟馆抽大烟，一抽就是半天，廖先生就耐着性子在外等候，一直等他们把瘾过足再同他们谈帮助筹款之事。

学校在经费十分短缺的条件下，仍然千方百计地改善学生的生活。我们每个学生都发了一套黄卡叽军服、一双皮鞋，多半在开会或节假日作为礼服穿，平时学习训练只穿一身质量很差的灰布军服、粗布袜和草鞋。伙食也常得到改善，常能吃到肉类、鸡蛋等营养品。军队生活十分严格，每顿饭前，总要先集合站队，由值星官发了口令才能动筷，饭后仍要集合由值星官宣布注意事项，官兵同吃同住。因黄埔军校是初建，所以居住条件一开始都很艰苦，不少房子多年失修，有的是临时修建，有的则是用毛竹临时搭成，但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而来，毫无怨言。

中山先生出席开学典礼

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，这一天，我们军校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。黄埔军校学生的四个队全部列队大操场，接受中山先生检阅训示。讲台上，站着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，蒋介石和廖仲恺伫立一旁。全体学员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，大家屏住气，全神贯注地准备恭听中山先生讲话。中山先生终于发话了，他谈了很多内容，主要讲了为什么要办军校，并追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，总结了几次起义失败的原因，强调了建立自己军队的重要性。他说，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，但革命仍未成功，只得到一个民国的空名，果实都被军阀弄去了，到处在割据，各人

都有自己的帝国主义主子，因此我们不革命不行。他还认为，苏联革命的时间比我国迟，但成功了，这是由于他们有革命的军队。我们要吸取教训，建立军校和自己的军队。总之要以俄为师，效法苏联等等。中山先生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之久，我当时的印象是，中山先生口才很好，他常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，并举了大量生动的事例，使我们很容易理解。他讲话没有架子，没有一点装模作样的官腔，使人感到十分平易近人，我们就象是听革命故事，听完一个又一个。听了中山先生这一讲演，使我明确了不少道理，学习训练的劲头也更高了，也越来越感到这次千里迢迢来到黄埔，路子是走对了。不少同学也感到听得不过瘾，不够劲，觉得时间太短了。大家都有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之感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这一天，广州的天气很热，大家穿着厚厚的卡叽军服和皮鞋，顶着太阳，抱着枪一动不动地伫立着，个个大汗淋漓，可能是因为思想高度集中，谁也没有顾得上这些，直到演讲完毕，大家把袖筒放下，汗水顺着袖筒直往下淌，里里外外都湿透了。

在校经历的几件事

在校期间，除了学习之外，我们经历了几件事。

黄埔军校在黄埔岛上占用了两部分，一为旧海军学校，一为旧陆军学校。有一次，海军学校失火，我们各队学生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救火。当时唯一的消防用具就是脸盆，大家迅速排接成了几条长龙，舀起珠江水一盆一盆传到前面泼向烈火，有一个名叫傅维玉的同学在救火中被烧伤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终于扑灭了大火。

上海“五卅”惨案后，引起了省港工人的大罢工。帝国主义及

其买办势力加紧对罢工工人进行迫害，遂有不少工人跑到军校来躲避。军校立即下令予以热情接待，我们都参加了接待工作。广东商团偷运武器到广州，被中山先生下令扣留，派海军将装运军火的外轮武装押送进港，我们又奉命前往搬运，大家登上外轮一箱一箱把军火扛下了船。由于这事又引起了广州商团的不满，英国人的买办陈廉伯为首的商团发动叛乱，我们黄埔学生军即参加平定战斗。我们三队一排在郭排长率领下进驻广州，保卫省财政厅，其余各队参加许崇智粤军解决商团的战斗。

中山先生观看军事演习

中山先生北上前，在黄埔岛上观看了我们一期学员进行的一场野外军事演习。演习前，我们全副武装，包括背包、各种必备衣物、雨衣、步枪、子弹二百发、短锹、短镐、饭包、水壶等等共重约二十五公斤，次第进行各种科目演习。如：急行军、搭帐篷宿营、构筑各种工事、渡河、攻击、防御、追击等等。大家个个劲头十足，圆满完成了各项演习科目。演习结束后，大家集合起来，中山先生走到我们面前，对演习作了讲评。他说，在这次演习中，我看到了大家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斗志，同学们娴熟的动作简直同实战一样，很真切，我很满意。尤其是在演习中戒备严谨，攻击中冒险犯难表现出的成绩，我印象很深，在现有条件下能达到这样的水平，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和鼓舞，因为我马上就要北上了。接着他就谈了北上的事，他说，我这次北上，估计不会取得什么大的成果，他们（指北洋军阀）是不会听我话的。但我明知这样也要去，我要借助他们的讲台来宣传我们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。他们召开的国是会议，实际就是分赃会议，

与我们的国民会议是两回事。我身体已不太好了，今天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军队，看到大家的训练、演习这么出色，我北上后不管承担什么风险，就是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听到这儿，我们都热泪盈眶，大家都担心中山先生的身体能否经得起北上的疲劳。从此，我们心里就产生了很大的顾虑。没想到，中山先生北上后不久就在北京病逝，这话不幸而言中了。

进行东征完成中山遗志

中山先生北上后不久，我们就进行了第一次东征。我们一期同学的第一仗是在淡水进行的。在战斗中，我有几件印象很深的事。在攻打淡水城前，我们黄埔同学们还没经历过真枪实弹的战争，最近乎战争的就是中山先生看我们的那一次演习。目前，城内守军是陈炯明叛军的杨坤如部，该军防守十分严密，全部退缩城内进行顽抗。杨令部下用碎棉布包起来蘸了油点起火挂在城墙的四周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，我们进攻的情况一目了然。但同学们士气极高，纷纷组织了爬城敢死队。我队同学江世麟在爬城前写了一封与家人的诀别信，表达了决一死战的决心，结果他第一个登城而壮烈牺牲。

当时，我已在通讯连当排长。我们的工作很艰巨，部队一到驻地，马上就要沟通各部之间的联系，我们要在部队到达前即进行架线，而拆线时要等到部队开拔才能进行，拆了线又要赶在部队到达前架设完毕，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。在一次战役前，校本部指挥所进驻了前沿阵地，我排负责架设从指挥所到炮兵观察所的电话线。我们架线没有任何先进的工具设备，只是用竹竿扛着电线，猫着腰边跑边放线。这一次因地处阵地前沿，敌人时有

冷枪打来，而我们的身体则经常被暴露出来，成了敌军的活靶子。正巧我弯着腰放线，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一颗子弹擦着头皮把我的军帽掀到地下，叫战友一看，子弹已擦掉了头发，头上留下了一道印记，只差几毫米就报销了。当时也没感到有多害怕，因为许多同学都在战斗中牺牲了。

攻克淡水后，通讯排随军进城，又兼做后勤、看管俘虏等工作。因叛军没有被最后消灭，有不少俘虏还不很老实，有的捣乱，有的叫疼，有的闹肚子饿。这时城外敌人又进行了反扑，四周枪声大作，俘虏们又骚动起来。我们黄埔学生军的素质与其他旧军队不同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并没有惊慌失措，而是耐心向他们进行宣传，陈以利害，又给他们包扎伤口，弄东西给他们吃，很快就平息了俘虏们的骚动。这些都是在学校里课堂上学不到的。事后，大家都深深感到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之所以能处理妥当，是与在学校期间的政治工作和中山先生的多次教诲分不开的。

当东征部队打到兴宁时，前线传来了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。随即，校本部指挥所决定召开追悼大会，我们黄埔在兴宁一带的部队都参加了。大会由蒋介石主持，周恩来宣读了悼词。大家对中山先生的逝世都感到十分悲痛，联想起中山先生北上前观看我们演习后说的那一番话，就更加伤心。在前线，全体官兵把悲痛化成了力量，士气更加高昂，对叛军作战更加果敢有力。没多久，我们就打到了潮汕一带，平息了陈炯明的叛乱，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，陈炯明也逃往福建。

平定杨、刘叛乱

陈炯明叛乱既被平定，滇桂军阀杨希闵、刘震寰又在广州发

动叛乱，我们立即回师广州讨伐。杨、刘二人一向瞧不起黄埔学生军，曾扬言只要派一营人马就可以吃掉黄埔。在我们东征节节胜利时，杨、刘二人感到情况不大妙，就在广州先行下手。时我已调军校工作，任入伍生一团五连连长。

杨希闵属下的师长赵成梁，其师部指挥所就设在珠江对岸的石牌火车站，该师战斗力较强，杨也经常吹嘘这支部队，时杨希闵正在师部。东征部队回师广州后，黄埔第三期的入伍生队也参加了平定杨、刘叛乱的战斗，他们担负了正面渡江攻击赵部叛军任务。这时，苏联顾问随同黄埔学生，把一艘停泊在黄埔岛附近江中的废旧军舰“飞鹰”号（从前北洋海军奉命南下追捕康、梁的军舰）拖到石牌火车站对面，利用军舰上的旧大炮对准石牌赵军的师部轰了几炮，说也凑巧，一炮命中了赵师师部指挥所，师长赵成梁毙命，杨希闵吓得要命，连忙拖了赵尸逃入广州城。在黄埔学生军的攻击下，赵师很快就被打垮。当我校一支部队开到了瘦狗岭、龙眼洞一带时，忽然一支军阀部队路经此处发生遭遇战斗，黄埔同学们马上各自为战，人自为战，把平时所学都利用到战斗中来，没有一点慌张忙乱的现象，表现了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养，很快将他们消灭。

（根据作者口述整理）